

D691/150

旁门

国学中的

曹英◎著

京华出版社

帝王左道



左道

一种用晦如明的智慧，
一种掌控人生主动权的手段，
一种进退自如的规则，
一种处世方圆的策略，
一种危机关头迅速应变的机变之道，
一种获得一生成就的成功心法，
一种运筹帷幄的不变法则……

左道旁门

国学中的

曹英◎著

京华出版社

上部

帝王左道

一种用晦如明的智慧，
一种掌控人生主动权的手段，
一种进退自如的规则，
一种处世方圆的策略，
一种危机关头迅速应变的机变之道，
一种获得一生成就的成功心法，
一种运筹帷幄的不变法则……

责任编辑：王 建
封面设计：颜国森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学中的旁门左道 / 曹英著. —北京：京华出版社，2008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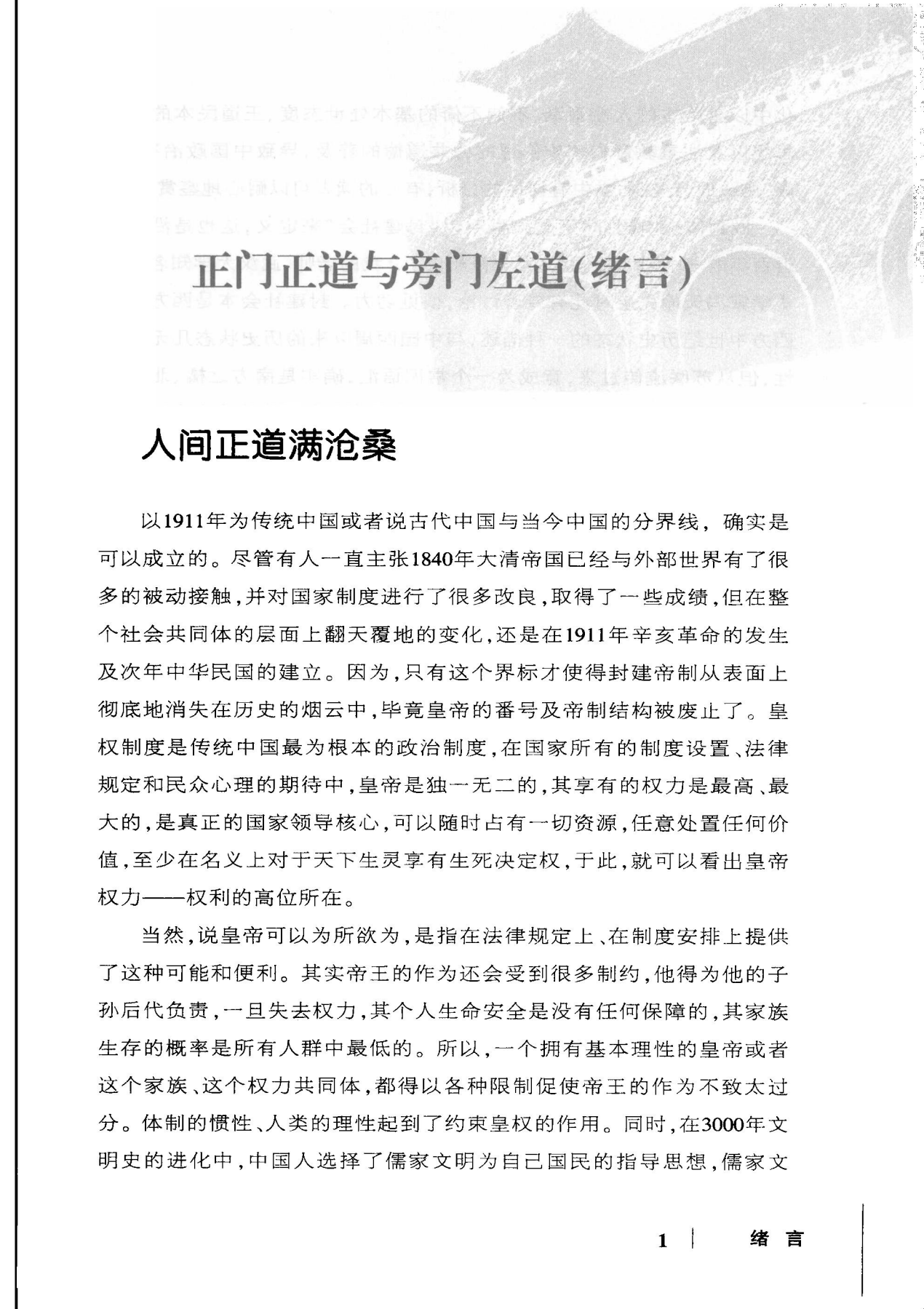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80724 - 540 - 7

I. 国… II. 曹… III. 权力 - 研究 - 中国 IV. D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8594 号

著 者 ☐ 曹英 著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)
经 销 ☐ 京华时代图书 (北京) 有限公司
(010) 63993657 63993659
印 刷 ☐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☐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
字 数 ☐ 580 千字
印 张 ☐ 42 印张
印 数 ☐ 5000 册
出版日期 ☐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☐ ISBN 978 - 7 - 80724 - 540 - 7
定 价 ☐ 69.00 元 (全二册)

京华版图书，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正门正道与旁门左道(绪言)

人间正道满沧桑

以1911年为传统中国或者说古代中国与当今中国的分界线，确实是可以成立的。尽管有人一直主张1840年大清帝国已经与外部世界有了很多的被动接触，并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很多改良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层面上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还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及次年中华民国的建立。因为，只有这个界标才使得封建帝制从表面上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，毕竟皇帝的番号及帝制结构被废止了。皇权制度是传统中国最为根本的政治制度，在国家所有的制度设置、法律规定和民众心理的期待中，皇帝是独一无二的，其享有的权力是最高、最大的，是真正的国家领导核心，可以随时占有一切资源，任意处置任何价值，至少在名义上对于天下生灵享有生死决定权，于此，就可以看出皇帝权力——权利的高位所在。

当然，说皇帝可以为所欲为，是指在法律规定上、在制度安排上提供了这种可能和便利。其实帝王的作为还会受到很多制约，他得为他的子孙后代负责，一旦失去权力，其个人生命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，其家族生存的概率是所有人中最低的。所以，一个拥有基本理性的皇帝或者这个家族、这个权力共同体，都得以各种限制促使帝王的作为不致太过分。体制的惯性、人类的理性起到了约束皇权的作用。同时，在3000年文明史的进化中，中国人选择了儒家文明为自己国民的指导思想，儒家文

化中以善为本的人性假设、不偏不倚的基本处世态度、王道民本的政治思想以及注重教育和家族伦理的公共道德的普及,导致中国政治有“中庸”的一面,这在后文中有详尽的分析,有心的读者可以耐心地鉴赏。

说到传统中国,时下国人喜欢以“封建社会”来定义,这也是沿习了近百年的一个习惯性词汇,完全普及化了。我的老师、武汉大学知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对此有专著讨论,很见功力。封建社会本是西方人对西方中世纪历史状态的一种描述,与中国西周以来的历史状态几无可比性,但从苏联流传过来,竟成为一个常识语汇,确实是南方之橘、北方之枳。这里不展开这个论题,只点化一下,说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态还是君主专制,与“封邦建国”的中央——地方权力安排(封建制度)无关。

本书重点分析皇权时代中国社会和宫闱变革斗争及其结果,侧重于政治权谋的分析。在国家公认的权力制度之外,还有许多潜规则和“黑规则”在大兴其道,其中表现出的许多“政治智慧”,在现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津津乐道,电视媒体也公然鼓吹,甚至有一呼百应的成效,“学术明星”因此招摇过市,说明这种“谋略”的超强影响力。正道不畅,旁门左道自然生意兴隆,歪门邪道亦是“财源茂盛达三江”了。

应该说,正道政治在传统中国还是主流,在3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演变中,正气还是压倒了邪气,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,道德还是居于优先地位,否则很难解释文化传承的不中断性。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流传固然强化了国人进入现代化的困难,但对于造就中华文明、道德和文化的功绩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正道政治,与邪道政治及所谓“政治智慧”的阴谋诡计根本不同,在于对人性的假设上,在政治思想的分野上,也是儒家、法家及道家、兵家思想的不同重心所在。西周后期,王道堕毁,孔子思想开始进入朝堂,为知识分子所接受、传播,到孟子、荀子发扬光大,继承发展“孔子主义”,渐有战国后期的显学地位,已经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一种思想体系。虽然秦始皇祭起法家思想的大旗,反潮流,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现实又成了儒家生命力的佐证;到西汉建国50年后,汉武帝树起了“独尊儒术”的猎猎

大旗，儒家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；到隋唐之时，儒学地位已成为国家意识；两宋以国家考试、官员录用和法律安排确证了这一事实，儒学已经稳居中华文明的“老大地位”。明清之际只是这一潮流的顺延而已。从儒家地位的这个流程看，春秋战国时期为发轫，汉朝时期为奠基，唐宋时期为定型，明清时期则是扬波阶段了。

儒家的正道，对于旁门左道的权术、歪门邪道的阴谋诡计是排斥的，但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十分热衷，甚至视为枕中之宝。在国家治乱的权力结局中，也是乱世常有、治世稀见，盛世犹如旷世奇珍，可遇而不可求。正人君子难得善终、奸臣大佞横行其道，也是官场正常现象，所谓“人间正道”，沧海桑田，充满不可预测性，充分体现了皇权政治的“魔力”。

正道·邪道·进道·退道

我一直以为，如果按照普通人喜欢用善恶二分法来分析先秦各家思想的话，可以笼统地提出正道、奸道（邪道）与进道、退道两种根本对立的流派，或者说是四种不同的治国模式、行为方式、心理意识和国家哲学。

儒家可称为“正道”。儒家基于人心善的假设，建构出思想体系。孔子没有明确提出人性是善是恶，但还是强调正人君子的善的稟性的先在性。孟子从现实的基本事实出发，得出人性善的基本结论。孟子在《公孙丑上》篇中说，人都有善的因子，就是“四端”：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隐之心；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惻隐之心非人也，无羞恶之心非人也，无辞让之心非人也，无是非之心非人也。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

之始然、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

孟子看到了现实中人性善良、温情的一面，他说，有一个孩子在井边玩耍，马上要跌到井里了，旁边的人会本能地救助他。这种本能不需要任何人提醒，无须任何人教导，也没有周围人的压力和督促，“不是为着要和小孩爹娘攀交情，不是为着在乡邻面前博得好名声，也不是厌恶小孩的哭声”，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“善”，是人性的基因。由此，孟子开始夸夸其谈，谆谆教诲起来。

他说，“每个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心。先王因为有怜悯别人之心，就有怜悯别人的政治。凭借这种怜悯，实施治国措施，治理天下就像运转小物件一样简单。一个人，如果没有同情心、羞耻心、推让心、是非心，就不配称为人。同情心是仁的萌芽，羞耻心是义的萌芽，推让心是礼的萌芽，是非心是智的萌芽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是社会基本公德，有了这四种品德，就是正人君子，就是真正的人了。人有这四种美德的因子、基因，就如同人有四肢一样自然而然，只要称为人，这些因子就不会缺少。如果具有这些人的因子，却不去发扬出来，反而认为自己不行，则是自暴自弃；如果认为他的君主不行，则是对君主的诽谤。每个人都应将自我发挥出来，如同正义的火焰，熊熊燃烧，不可扑灭；如同潺潺山泉，流出山谷，终会汇成江河。人人如此，就会天下安定；人人不如此，赡养父母都不可能，安居乐业也是妄谈。”

儒家的性善假设，在战国中后期遭到现实政治的挑战。在一个竞争的时代，崇尚实力成为国际潮流，各国的改革均以富国强兵为号召，提升国家竞争力是唯一的指向。经济实力、国防实力，即便人的竞争力，都以战功大小、谷物产量为导向。利的崇拜的前提，是人性对稀缺资源独占性占有的渴望。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时成为社会共识，所以倡导实力哲学的法家思想成为各国争相采纳的主流，人性“趋利避害”的判断取代了善的判断，为各派人物大加宣扬。

在这种潮流冲击下，孔子、孟子的元典式思想遇到了极大挑战，甚至是毁灭性的挫折，几乎要摧毁儒家大厦。但儒家思想人物的层出不穷、后浪推前浪的进步性跨越是其绵延不绝的根本人才优势，荀子在这时就挺

身而出了。荀子不忌讳人性非善的判断,反而认同人性好利的假设,但他认为经过后天的教习、道德培育和政治社会化等的感化、教育及法律规制,好利之人是可以成为圣人、正人君子的,这就是“化性起伪”。后天教育的重要性是人性转化的基础,这正是儒家思想大展拳脚的极好契机。儒家思想不但没有遭到灭顶之灾,反而寻找出圆融各派、冲决瓶颈的思想机遇,在孟子的王道政治的说教之外,荀子点出了儒家政治的核心——礼法并用的政治哲学,成为后世2000多年中国传统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石。所以,谭嗣同说:“二千年来之学,荀学也。”

在人性上得到逢源后,儒家正道思想就可以得到圆通了,这就是“孔孟之道”的核心——仁政、王道、礼治。在政治关系上,就是君主要爱惜民力、善待臣民,朝堂上注意分享各种资源,特别是要心存惻隐之心,心怀天下黎民,不过分使用政治权力,故有重民、利民、护民、教民的民本主义,与现今中国倡导的权为民所用、利为民所谋、情为民所系的“新三民主义”可谓异曲同工。在政治权力的运作规则上,强调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在君主利益至高无上的前提下,每个官员发挥自己的高尚品德、聪明才智,为国造福、为民服务,将“以德治国”的“人治”思想发扬光大。

儒家排斥阴谋诡计,是正道;法家则极力倡导阴暗的权术,是奸邪政治。

法家认为,人性是趋利避害的,人是求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嗜利、嗜血的动物,人性的阴暗、败坏是客观的实在,无法避免,但这不是国家衰亡、社会堕落和个体失败的原因,这种人性不利反而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。现在世界的衰落不是人性的原因,而是人没有因势利导、利用人性而发奋图强的结果。只要有自我的努力,任何结果都会发生。比如经济落后、物产稀薄、兵穷将寡的“西方”秦国,因自我努力,成就中国的一大霸业,最终一统天下。如何克服人性弱点、利用天下人的缺陷为我所用,是帝王政治的重要课题。法家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,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儒家思想的思想体系。

关于人性问题,商鞅在法家思想人物中做出了经典的概括,他认为,民具有三方面的弱点,这些弱点是其趋利避害人性的集中表现,也正是君主利用赫赫威势、残酷暴力和倾国钱财的机会。商鞅指出,民之三大弱

点是贫穷、怕死、愚钝，即穷、怯、朴，穷则希图富贵，可以“驱以赏”，以利诱，使其农耕，为君主贡献粮食，还可以战功诱使其服从国家战争需要；怯懦胆小，害怕官府、畏惧权势、痛恨战争，但君主却可以以恶制恶，发挥刑治效能，“劫以刑”，耕战是民之苦事，使其在酷刑与死亡恐惧面前，不以农耕为苦、不以战争为惧，同时国家加大宣传与奖惩力度，变怯为勇，化苦为乐，从而培养民以农事为乐、以参战为荣、以杀敌立功为唯一目的的社会风尚，“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，见不战之辱则苦生。赏使之忘死，而威使之苦生”。民鲁钝愚朴，易受人役使、控制，正是君主只需其力，使其畏刑利诱的最好素质，必须创造条件坚固这种民之素质，“圣人之治也，多禁以止能，任力以穷诈”。因此，君主治民，先在愚民、苦民、恐吓民。“夫民之情，朴则生劳而易力；穷则生知而权利。易力则轻死而乐用，权利则畏罚而易苦；易苦则地力尽，乐用则兵力尽。”

法家认为，人性本恶，趋利避害是自然属性，所谓“仁爱”、“人情”，都是儒家创设的欺人之谈。韩非就对儒家力倡的父子之亲、夫妻之爱、兄弟之谊、君臣之义进行了逐条批驳。他说，家庭生育儿子，举家庆贺；如养育女儿，则不惜溺杀，同出父母之怀，为何得此决然不同的待遇，“虑其后便，计之长利也”；夫妻早年同甘共苦，相濡以沫，但人过中年，妻子色衰呈必然形势，而丈夫好色之心不减，纳妾就已自然，此时，无奈的妻子、嫡子只希望丈夫、父亲早死，好保住既得利益，否则新到的女人、新生的儿子就会威胁其地位与利益；丰年路边饥者亦施舍饭食，饥年兄弟求助亦难于帮助，非无手足之情，但在利害面前，自己的生命总在首位。因此，韩非断言，即使至爱亲属之间也是利益当先，其他关系自然可想而知，君臣间自然非有忠义，只是一种买卖关系——君出卖爵禄，臣出卖智力。“臣尽死力以与君市，君垂爵禄以与臣市。君臣之际，非父子之亲也，计数之所出也。”

既然人性在至亲家族中也是如此，一般伦理关系就谈不上所谓仁爱亲情了。治理国家、社会的手段，就无须仁义道德的“德政”。王道，只有霸道一途，也就是以力取胜，实力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性因素。所以，制民必须以暴政，这是强化“君势”的必须手段。暴用民力，大兴兵戈、发动战争，大兴土木、修建浩大工程，民疲于劳役，困于苦难，久居贫穷苦难，就会依仰官府与

君主的权力,就会俯首帖耳,屈从秩序,社会也就稳定平安了。君主存在一日,就必须处心积虑,设法使用、扩大、维持权力。制约他人最有效的手段,是利用他人的弱点,给予其致命一击。人性恶之表现,是好利、避害,恐惧暴力,珍惜生命,贪生怕死,因此暴力威胁、镇压是最有力的手段。君主依赖暴力,最大程度地发现、使用暴力尤其是国家暴力的功能,是取得、维持秩序切实可行的方法,如是,就有酷刑主义、刑罚哲学、制臣之术;暴力获得来源于君主控制力、影响力的增强,战争是展示威力、掠夺资源、扩充权力的最好方式,所以,准备战争、扩大战争、依赖战争,又成为法家加强君主权力的必然方式。商鞅明确提出“以战养战”、“以战去战”,以天下为战场、以天下之人为战士,为一君之暴利,用战争消灭战争;要想赢得战争,没有强大国力无异于纸上谈兵,所以必须富国即富君,因此奖励农耕又成为基本国策。国家的一切政治与秩序,均以君主利益为转移,君主的权势、权威为秩序的唯一要件、唯一目的,君主以夺取、占有、扩展权力为核心目标,权力以人性恶为假设,国内以民、臣为敌,国外与诸侯、邻邦、异族为敌,暴力是解决所有争端的最有效手段,这是法家君权中心论的主要表现之一。

法家认为,君臣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关系,而非儒家所主张的君民关系。对君主权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臣,君臣关系的好坏,对君主统治能否稳定影响极大。臣绝对服从、从属君主是君主统治秩序的充分必要条件,君主政治秩序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群臣无条件地服务君主。基于人性恶的假设,法家均相信,君臣之间,情不及父子、义逊于兄弟,不存在仁义、忠义的道德规范,只是一种利害关系,是虎狼关系;君主以爵禄交换臣子的智力,双方均在暗中角力,希图吃掉对方,“一日百战”,因此,对于君主来说,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信任臣子,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,信人则制于人”。这是法家对于人际关系的核心命题,相信别人是做人的天敌,别人就是自我利益的地狱;诚信是权力的天敌,仁爱是专制的毒药。“明主之牧臣也,说在畜鸟。……驯鸟者断其下翎焉,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,焉得不驯乎?夫明主畜臣亦然。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,不得不服上之名;夫利君之禄,服上之名,焉得不服?”

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,治理国家的首要条件不是治民,而是治臣。在

国家体制确定后,官员是决定性的因素。如何治官,可以有体制性的监督、考课、选拔,但也需要暗中的权术操纵。法家专门提出制臣的政治权术理论,这是法家成名的三件法宝之一,而且在法、术、势三件法宝的取舍中各有侧重。“术治理论”以申不害、韩非最为著名。近代著名史学家熊十力即称术治思想在韩非思想体系中占有最突出、最重要的地位,他说:“韩非之书,千言万语,壹归于任术而严法,虽法术兼持而究以术为先。”

所谓术,就是权术,在持法家思想的人眼里就是阴谋诡计。韩非子对此定义说:“术者,因任而授官,循名而责实,操杀生之柄,课群臣之能者也,此人主之所执也。”与法针对全体臣民不同,术专用于制臣;非君臣共守,只是君主独自享有;不可公开颁行,只能暗中操作,所以术是君主独操,专门对付臣属、秘密操作的心计、阴谋。“术者,藏之于胸中,以偶众端,而潜御群臣者也。”

“术治”的要害在于“暗箱操作”,在于出臣不意、突然袭击、一招制臣于死地。这种君主独自享用的驭臣的阴谋诡计,在于充分发挥权力的恶毒、诡诈,如刑威利诱、神秘叵测、法外施恩、倒言反事、文字狱等,莫不如是。法家之“术”在灵活运用道家静因无为哲学,以退为进,不争之争,针对多言得祸、多动必失的特点,主张君主以暗见疵、深藏不露,伺机出击,因为君主的明察显露出来,别人就会防备他;君主的糊涂显露出来,别人就会迷惑他;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,别人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;君主的愚昧显露出来,别人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;君主没有什么欲望显露出来,别人就会探察他;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,别人就会引诱他。

所以,作为君主的,只有以法决胜天下,“吾无从知之,惟无为可以规之”。(我没有什么办法去了解臣下,只有以无所作为的方法来窥测臣下。)君主以一人之力,与百臣一日百战,必须变被动为主动,隐藏智慧、好恶、是非,不事先决断,不表白意向,则可窥视群臣、以静制动,同时在众多耳目的支撑下,明察秋毫,提高专断权力的效率,最终制驭臣僚。所以,君主权术,重在“善为主者,倚于愚,立于不盈,设于不敢,藏于无事”,达到“至智弃智,至仁忘仁,至德不德”的理想治界。

按法家的设计,君主治臣,除阴毒的“术治”外,还必须妥善用“势”。

“势”实际上也是“术”的一种,“合理利用国家暴力”就是势治。君主将手中掌握的权势资源发挥到极致,玩弄群臣于手掌之中,任意玩捏,使其死心塌地服从,是为理想效果,否则会如失去爪牙、为猎犬戏弄的老虎,为臣戏弄。君主之势首在君主拥有控制臣属的两种致命武器,即治国“二柄”。一是赏赐。官吏追随君主,无非求得财富、地位、权势与荣誉。对于有利于君主政治的“法术之士”,君主即可运用名利以引诱、高官厚禄以收买,使其出卖智力,全身心投靠;赏赐之术,不可久用,不可常用,因为一则君主掌握的名利资源有限,难以长久满足臣子无休止的欲望;二则恩赐之物遵循“边际效益”递减原则,其价值不断贬值,以贬值之物质赏赐,不断增长之期望,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,所以,法家极力鼓吹“刑九赏一”,即重刑主义的国策,这就是君主驭臣的第二件利器——杀戮。好利以利诱,避害则以害压。恐惧畏死是人之本性,严酷刑罚正可对症下药。

法家强调,君主秩序的维持,不在臣子的忠诚,而在设法使其失去破坏秩序的条件,“明主不恃其不我叛,恃吾不可叛也;不恃其不我欺也,恃吾不可欺也”。君主任用权势的首要目的在于削弱臣子的力量,迫使其从属自己,因为君、臣力量的对立转化是零和博弈,此消彼长的。“臣利立则主利灭”,二者势不两立,“主利在有能而任官,臣利在无能而得事,主利在有劳而爵禄,臣利在无功而富贵”。所以,法家反对信任忠臣,以其为法之害、欺世盗名于事无补的蠹虫,臣子于君主有用与否,在于其是否全部出卖智力及智力是否生利于君。“将治乱,在乎贤使任职,而不在于忠也。故智盈天下,泽及其君;忠盈天下,害及其国。”对于忠臣无用、忠臣害国论,慎到有其独到认识。他认为,忠臣至少存在三大缺陷,一是忠臣喜欢不在其位而谋其政,触觉破坏制度之设,使他臣无法尽其职守,“忠不得过职,而职不得过官”,忠与制度矛盾。二是忠臣常有,国君却未必常安,忠与治乱没有必然联系,“乱世之中,亡国之臣,非独无忠臣也;治国之中,显君之臣,非独能尽忠也。”三是忠不等于智,有些忠臣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智慧不够却管事过多,弊多利少,“毁瘁主君于暗墨之中,遂染溺灭名而死”。

而且,法家认为,君主最大的祸患来自于与君主最亲密或可能最亲密的亲属、臣属,“万乘之患,大臣太重;千乘之患,左右太信。此人主之所

公患也。”维护君权，首要又在抑制重臣、打击权臣、控制近臣，强本抑枝，集权独断，造成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；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”的独裁局面。

儒家强调公开、公正地行使权力，互惠天下；法家则强调阴暗行使国家暴力，独利一人。君主在两家思想里都是利益的最后归宿，但儒家强调即使在过程中亦须有一般贫民百姓的利益在，所谓“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最终目的在普惠社会；法家则是独裁、独占、独享、独霸，以天下服务于一人，服膺于一人。正邪之别，一目了然。

在儒家、法家两家之外，还有两家思想对传统中国政治文化、民族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这就是道家、兵家。

道家，是老子、庄子倡导的学说。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。据说，孔子还周游到老子任职的楚国去请教“礼”的问题，这时孔子35岁，老子已经很年长了。后来有人就说这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思想巨人的峰会，是儒家思想、道家思想这两家影响中华文化最为深刻的思想体系的交锋，可惜没有文字的记载。孔子惜字如金，只是了了一语带过，说：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野。”到了战国中期，庄子横空出世，这位被誉为传统中国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在写出奇异诡谲的《庄子》后，道家正式登上先秦显学的大雅之堂。

道家思想的核心在“退”，在引而不发，在无为，在柔弱胜刚强，在“天治主义”，在自然和谐。

所谓“天治主义”，就是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以“无中生有”统帅一切。无为即为有为，政治上无为，即是有为的一种手段，也就是为了有为，即无不为。统治者顺其自然，不对百姓进行干涉，让其自由发展，天下即为太平。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

为政清廉，政策宽厚，百姓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则民风淳朴，社会安定；反之，君王政策严苛，贪得无厌，民风就狡猾，盗贼丛生，一切弊政、混乱均由君主而生。“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只要统治者清静无为，百姓就会安居乐业，老百姓和君主、政治权力的关系是：“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之；其次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故信不足，焉有不信。犹兮贵其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：‘我自然。’”最好的政治是无政府的政治，权力是制造社会动乱、资源损失和群众反抗的最大因素，

这其中便有自由主义的因子了。

由此,老子反对一切社会规章,甚至科学技术、文化教育、仁义礼制。反对有为政治,所谓以德治国、政治伦理主义、重视人事、以智治国、以法治国,都是无为政治的敌人。

老子抨击仁义道德,他说:“大道废,有仁义。智慧出,有大伪。六亲不和,有孝慈。国家昏乱,有忠臣。”统治者用巧智治世,造成官员、百姓躲避,及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的难堪局面,使诈伪的社会风气盛行;一味提倡孝慈仁爱、忠诚团结,恰恰是社会道德的堕落、公共道德的失衡,并不是因为提倡仁义道德后就有了道德的社会,而是因为不道德的现实致使道德说教的泛滥,反而造成道德的贬值、无耻的流行。“故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;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,忠信之薄,而乱之首。”

老子抨击以知治国,说:“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,国之贼;不以智治国,国之福。”老子说,愚民为国家之福,统治者以智御民,民以巧智防之避之,上再以巧智防民,如此恶性循环,自会造成奸伪滋生,哪里还有道德立身之地?南北朝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解释说:“以智术动民,邪心既动,复以巧术防民之伪,民知其术,随防而避之。思维密巧,奸伪益滋,故曰:‘以智治国,国之贼’也。”

老子抨击以法治国,说:“天下多忌讳,而民弥贫;民多利器,国家滋昏;民多技巧,奇物(怪异)滋起;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。”

所以,老子主张上无为、下有为的“垂拱而治”,“木在于上,末字于下;要在于主,祥在于臣。”无为为本,有为为末;天道无为,人道有为;无为乃君道,有为乃臣道;天道为尊卑先后的等级与秩序,人道效法天道,也有等级尊卑、先后秩序的分别。帝王以天地为宗,以道德为主,以无为为常:“帝王无为而天下功。”效法天地无为而无不为之;臣下官吏所司之事,使其各司其职,此为末务。帝王掌握治国纲领、原则,具体事务由臣执行。君令臣行、君舒臣劳的政治原则与体制。所以,唐代名臣魏征说:“垂拱而治。何必劳神苦思,代百司之职役哉?”

在此,老子进一步以虚无之境提出治国思想,说,君主内心清净空明,由此观照万物,聪慧知天,掌握自然规律,即能遍知天下,心静自明,

明而后智，圣智知常。“明于天，遍于圣。”内心清静，而遍于圣，成为明白自然之道之人，由此兴办事业，充分调动各部门、各方力量，使其各司其责，达到上得天时、下得地利、中得人和，天下无不有成功者。“静而胜，动而王，无为也而尊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夫明白于天帝之德者，此之谓大本大宗，与天和者也；所以均调天下，与人和者也。”

“官施而不失其宜”，切合时宜；“拔举而不失其能”，有才能的人，办好事、办实事，天下自然归化。反对君主自以为是，包揽一切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的力量。

在政治措施上，老子主张薄税敛，轻刑罚，慎用兵，尚节俭；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；绝圣去智，绝仁弃义，使民“见素抱朴”，回归自然。甚至不惜使民成为愚民，提倡“蒙昧主义”。“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”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，绝学无忧。”

由此，老子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法：“治大国如烹小鲜。”“烹小鲜者不可扰，治大国者不可烦。烦则人劳，扰则鱼烂。圣人无为，使人各安其自然，外无所烦，内无所畏，则物莫能侵，虽鬼无所用其神矣。”要吃鱼，但不能使其乱。统治者少活动，使民失去有为的条件是无为政治的两大根本原则。

老子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不是其治国哲学、治世政策，而是他提出的治术、处世之道。老子的为人处世之道，或者说官场哲学，重在一个字，就是贵“柔”；两个字，就是“无为”。以柔制胜，不敢为天下先，在后发制人。“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。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与之争。”常说的“将欲夺之，必固予之”，就是这样的写照。

柔之哲学，在思想境界、方法论上，是静观，守弱用强，知盈处虚，居上谦下，不争之争。

柔弱胜刚强，守弱用柔。老子以无形而有形、有形而万形的水做比喻，水是至柔之物，随遇而安，但水却可以积蓄力量，冲决一切障碍，洪水猛兽，浩荡飘渺，无敌天下，所以老子的退道可以称为“水之术”。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，无有入无间，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无为之益，天

下希及之。”这应证了老子的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的判断。

人与万物一般，生时柔弱，赤子孩童，柔弱无骨，却是茁壮成长之生机勃勃的气象；老了将死之人物，却是僵硬、枯槁，坚硬无比。所以，老子说：“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”

于此，老子提出了居上而谦下，贵以贱为本，目大于其纲，自处柔弱的为人哲学。

不争莫之争。老子认为，一切罪恶源于争。君子好名，小人好利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战争、竞争的不可避免，有人出人头地、好强好胜，但却是最先遭遇毁灭。比如山中树木，表面上看巨木参天，是胜利者，但进山砍伐，首选巨木；小木弱不禁风，老木苟延残喘，虽然被视为弱者，却能保全性命。所以，老子说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是故，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故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

为而不争，人人与我友善，视我为可以信赖之人，但是，他们头破血流之时，我可以兵不血刃坐收渔利，天下莫能与之争，不争无尤，无争而无不爭。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（深沉虚静）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（简治），事善能（圆通灵活），动善时（时机）。夫唯无争，故无尤（怨咎）。”老子以水为喻，钱钟书评价甚高，说：“治人摄生，有所知见，驱使宇宙间事物之足相发明者，资其缘饰，以为津逮。……非无山也，高山仰止，亦可法巴，老以其贡高，舍而法谷；亦有火也，若火燎原，亦可法也，老以其炎上，舍而取水；水自多方矣，孔见其昼夜不舍，孟见其东西不分，皆匪老所思存也，而独法其柔弱。”

曲全，“知其雄，守其雌。”“知其荣，守其辱。”持盈之道，“退道”。“持而盈之（抱守），不如其已。揣（锤击）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所以，要藏锋韬光，表面上收敛锋芒，隐藏心迹，掩饰野心，解除敌之威胁，麻痹其警惕，等待合适时机，以达成政治目的，图强以示弱的韬晦权术清晰地露出水面。

在此，老子再次提出“有德无形”的“水”作喻：“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

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”平静如水，清明照人，不扬波起浪，可以效法。内心明眼亮，外大智若愚，“胜物不伤”。虚无恬淡，有德而不自得，有功而不居功，不雕琢意志自鸣高尚，不讲仁义而行为修美，无功名而天下大治，无江海之劳而闲散无拘，不导引而长寿。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辞东流，大之至也。

兵家以春秋末期的孙子为代表。兵家讲的是战争，是以军队这种最具杀伤力的国家暴力来解决纠纷，关系到国家存亡、民众生死，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凶险的大事。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”战争胜败，取决于两方的综合实力，取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，与将帅智谋也有很大干系。战争的战略，首要的在于争取主动，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所以它是“进道”。能够取得全国性胜利，不可贪图小利，而求一城一地的得失；能求得全军的胜利，不在乎一营一旅的存灭。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”

在战术上，孙子强调，要充分准备，不打无准备之战；灵活用兵，示形动敌，避实就虚，出其不意，集中兵力，迅速行动，“乱而取之”，“实而备之”，“强而避之”，“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”。

兵家的“进道”，与道家的“退道”，实际上是“胜道”的两极，与法家的“强道”，均可称为“诡道”，强调智慧的运用、机巧的把握和出敌不意的特殊效果。这和儒家的“王道”变异“霸道”亦可相得益彰。

正道典范与邪道秘籍

在对君道的规范上，唐太宗贞观时代的君臣关系、处理政治关系的条规，成为中国古代圣贤政治中最重要的范例，《贞观政要》等书也成为后世官场人物、思想人物共同信奉的教条。

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鲜见的贤明帝王，被誉为“千古一帝”。欧阳修对其赞不绝口，说：“盛哉，太宗之烈也！其除隋之乱，比迹汤、武；致